

● 中国历史

清代的赌博述论^{*}

王 美 英

(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,湖北 武汉 430072)

作者简介]王美英(1966-),女,湖北英山人,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博士生,主要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。

摘 要]清初,赌博之风并不严重,参赌的人也不多;清朝中后期,赌风颇为厉害,其花样之多,波及地域之广,参与人数之众,为此前各朝历代所不及。这不只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,而且给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。究其根源,在于清朝中后期政治腐败,对赌博缺乏抵抗力;社会闲散人员多,以赌博为寄托;赌博的消遣、图利功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,吸引众多人员参与。赌博与政治腐败密切相关,政治腐败之时赌博之风越厉害,赌博是政治腐败的标志,它又会加速政治的腐朽与没落。

关键词]清代;赌博;社会问题;研究

中图分类号]K249 **文献标识码**]A **文章编号**]1000-5374(2001)03-0304-05

赌博起源于人类的嬉戏娱乐。嬉戏娱乐本是人的精神文化生活,可以陶冶情操,添加生活的色彩,可以充实人的内心世界,也可以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,无可厚非,可是一旦嬉戏娱乐与金钱、利益、财富相挂钩,以金钱的输赢为目的,那就变成了赌博。赌博是在游艺基础上产生的,是一种不良的社会恶习,在我国传统社会流传甚久,比如斗蟋蟀、掷骰子等历史久远,政治清明时其流行不太普遍,越是政治腐败时,其风行得越厉害。清代非但继承了赌博这一社会恶习,而且越到中后期愈益猖獗。

一、清代赌博的概况及其成因

清初,赌风并不严重,参赌的人也不多。统治者鉴于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,鉴于明中后期赌博的巨大危害,采取了严厉的禁赌政策,对于赌博的人,不论兵民,“俱枷号两月”^[1](卷 826);开场窝赌及抽头之人,“各枷号三月并杖一百”^[1](卷 826),对于参赌的官员,非但“革职、枷责,不准折赎”^[1](卷 826),此后不再任用。除法律明文规定禁止赌博外,清初的康熙、雍正等几位皇帝还亲自干预赌博。太宗天聪元年(公元 1632 年)皇太极谕示刑部:“近闻游惰之民,多以赌博为事——嗣后凡以钱及货物赌博者,概行禁止,违者照例治罪。”^[2](卷 11)雍正六年(公元 1728 年),在得知安徽省城公开出卖赌具时,雍正皇帝颇为恼怒,给安徽巡抚谕示:“又如赌博一事,万不可宽者,而省会之地,尚公然市卖赌具,督抚两司,不能觉察——恐问之督抚大吏,亦无以自解也,著此通行晓谕知之。”^[3](卷 8)雍正皇帝还约束官员,严行禁赌,雍正七年(公元 1729 年)规定:“嗣后孥获赌博之人,必穷究赌具之所由来,其制造赌具之家,果审明确有证据,出于某县,将该县知县照溺职例革职,知府革职留任,督抚司道等官,各降一级留任。”^[4](卷 82)在法

律的禁止与皇帝的干预下,赌博之风不太严重,赌博的人也不多,即使是赌博,也不敢明目张胆,多是地下或暗中行事。这种情形持续了一段时期,就发生了变化。

乾隆年间,随着政权的巩固,社会的稳定,统治者已经忘记了明朝灭亡的教训,日益暴露出其腐朽的一面,非但放松了对赌博的限制,甚至带头参与赌博。上行下效,于是赌博之风从南到北,从东到西,迅速蔓延开来。南方有花会,花会赌博流行于浙江、江西、安徽、广东、福建、上海等地,其中尤以福建、广东为重。广东花会为 36 人名,任人投押,晨夕 2 次,每次开 1 名,得彩者给以 30 倍之利。北方盛行玩骨牌,骨牌为宋徽宗宣和年间所设,“骨牌之大者,不及寸许,截牛骨镶竹或木为之”^[5](第 490 页),玩法多样,通常以 4 人合局。除地方玩牌外,军队内部居然也公开赌博,乾隆八年(公元 1743 年),军内聚赌之事传入乾隆皇帝耳中,皇帝颇为生气,批评军机大臣:“闻得天津水师营兵丁,平日并不以操练为事——遇都统查阅日期,海口傍近地方,苟且塞责,略为驾驶。俟都统查回后,即在船内饮酒赌钱,并不演习技艺,以至有名无实”^[6](卷 194)纪律严明的军人尚且参加赌博,可见此时赌风之甚了。赌风既已蔓延,则一发不可收,及至嘉庆、道光以后,随着世风的日益败坏,社会闲散人口的日渐增多,赌博风行,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,不论性别、职业、地位,各类人员嗜赌成风。从京城到东三省,连协领、佐领等官,亦开局聚赌,军队亦不例外,公开聚赌。京城步军左右翼十二处开局聚赌,嘉庆皇帝为此处分步军统领,将其革职,先后孳获赌局 16 起,更甚的是王公大臣、八旗子弟亦卷入其中。嘉庆十三年(公元 1808 年),竟有护军营兵丁因为赌博在京城持刀杀人,“近年之中,旗人风气日渐浇薄——设局聚赌,稍有睚眦,即逞忿持刀相向——竟有敢于在行营近切处所持刀伤人毙命之事”^[7](卷 204)。非但如此,王府之中亦好赌博,咸丰皇帝的孝钦皇后喜欢赌博,经常召集诸王福晋、格格打麻将:“每发牌,必有宫人立于身后作势,则孝钦辄有中发白诸对,侍赌者辄出以足成之,既成,必出席庆贺,输若干,亦必叩头求孝钦赏收。至累负博进,无可得偿,则跪求司道美缺,所获乃十倍于所负矣。”^[5](第 490 页)上行下效,皇后带头赌博,其他人更是以赌博为乐,甚有以赌博为谋财之手段。同治、光绪年间,广州赌馆甚多,每年向政府交纳的赌钱约 1 000 多万两,且广州的地方官还奖励那些因赌博而致富者,广州因而成了赌城。清朝中后期的赌博之盛由此可见一斑。

为何清朝中后期的赌博之风如此之盛?我认为有 4 点原因:(1)朝廷腐败,对赌博没有免疫力。嘉庆、道光以后,世风日下,社会问题日益滋生,内忧外患日益严重,封建政府日落西山,气息奄奄,非但无能采取严厉的禁赌政策,而且其自身腐朽不堪,对赌博这种社会恶习没有抵抗力。(2)上行下效。上自朝廷,下至地方,各层官员参与聚赌,就连孝钦皇后都嗜好赌博,他们带头起了表率作用,其他各色人等纷纷仿效,皆投身于赌博之中。(3)社会闲散人员增多,他们无事可做,无业可就,就以赌博为寄托。清朝人口自道光以后突破 4 亿大关,人地矛盾突出,关系紧张,人多地少,很多人成为无业的游民,他们想不劳而获,想靠赌博侥幸取胜,获得钱财来谋生,而且他们还把赌博作为娱乐手段,以打发时光。可以说闲散人员是赌博的一支生力军。(4)赌博的消遣、图利功能吸引了众多人员参加。陈宏谋认为赌博之所以吸引了那多的人员,是因为它可以消遣与图利。赌博具有很强的刺激性和冒险性,吸引着很多人,赌博的成功,要靠机遇和技巧,赌博对于那些有闲阶层、人员来说,是消遣时光的一种手段,故而有很多人迷恋它。此外,赌博赢了还可以获利,可以获得一定的钱财,这对于那些想不劳而获的人来说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,吸引他们纷纷参赌。在上述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,清代中后期赌风猖獗,日甚一日。

二、清代赌博的特点

(一)花样繁多

清代的赌博名目繁多,方式各异,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换花样,具体有斗禽虫、打牌(玩纸牌、扑克、麻将牌)、掷骰子(掷老羊、掷状元)、压宝、花会、白鸽标、闹姓、彩票等。光苏州一地就有叶子牌九(排九)、摇宝、压宝、马吊、游和(游湖)、合和、幻和、翻百荣、控花、扑八叉、掷骰、投子、跌钱、斗蟋蟀、斗鹌

鹌、斗麻将等名目^[8](第 102 页)。斗禽虫即是以蟋蟀、鹌鹑等动物的打斗比赛为赌,胜者得钱,负者输钱,常有斗蟋蟀、斗鹌鹑、斗鸡等。打牌即是玩牌,有马吊纸牌、扑克骨牌、麻将牌等几种,它们的玩法近似,有“碰和”、“游湖”、“打天九”等名目^[9](第 285 页)。掷骰有掷骰子、掷老羊、掷状元等名目,其灵活性较大,输赢亦快。压宝亦叫押宝,有压铜钱、压权、摊钱(亦称翻摊)等几种。清代律例称摊钱为“抓金钱”。花会则是盛行于浙江、江西、安徽、天津等地的一种赌博方式,其基本玩法大同小异。白鸽标亦称白鹤票,“以千字文内八十字为字母,每日开二十字,听人猜买十字,以定输赢”^[11](卷 827)。闹姓是流行于广东的一种赌博,每当乡试、会试之时,即“取闹中之姓赌之,以所赌之姓中多中少为胜负”^[10](第 32—37 页)。彩票有吕宋彩票、赛马彩票等,赛马彩票盛行于上海租界,外国人赛马时,中国人则购其出售之彩票,以马之胜负定买票之胜负。

纵观这些赌博名目,有的是沿袭以前的,比如斗蟋蟀、打牌、掷骰子等,有的则是新的。即便是沿袭以前的赌博名目,但是其玩法和叫法有些翻新:斗牌中的骨牌以 32 页为一具,而清代则在 32 页之外,又增加了 80 页、105 页等几种玩法,而且清代还将骨牌图形画在纸上,其形状、大小就像纸牌。升官图在清代最流行,是掷骰中的新花样,是在纸上排列京外文武大小官位,掷骰子,计点数彩色,以定官员的升降,骰子 6 面:四为德,六为才,二、三、五为功,么为脏,遇德则超迁,遇么则降,遇功则升转^[9](第 285—286 页)。此外,清代还时兴了一些新的赌博花样,诸如:扑克牌、麻将牌等。扑克牌原是欧洲人发明,是改造中国的马吊牌而成,晚清由西洋传入,开始仅流行于达官贵人之间,紧接着富商巨贾效而尤之,至宣统末年(公元 1911 年),盛行于士庶民间。扑克有“对子、双对子、三同全手(即三同兼对子)、四同全色等名目”^[5](第 489 页),还有二十一点、爬沙蟹、提和尚、拖黄包车等戏法^[8](第 102 页)。因为扑克赌博简便易行,在城市中颇为流行,“京师、天津、上海、汉口皆盛行”^[5](第 489 页),玩的人也很多,“达官贵人之豪赌,以此为最,一掷万金,一夕数次者,时有所闻”^[5](第 489 页)。麻将又称马将、麻雀牌,它始于何时,尚无定论。清人徐珂认为:麻将牌“始于浙之宁波,其后不胫而走,遂遍南北”^[5](第 490 页)。姑不论麻将始创的具体时间,有一点是清楚的,那就是它是清代新创的赌博名目。麻将兴起后,风行各地,“光、宣间,麻雀盛行,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,名之曰看竹,其意若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也。其穷泰极侈者,有五万金一底者矣”^[5](第 490 页)。彩票赌博先是购买洋人的彩票,清人觉得那不过隐,又开始自己发行彩票。清朝末年,国产彩票出现,称发财票、签捐票,先是广东商人开始发行,后来政府又募钱专门办理,湖北、天津也发行了彩票。1901 年 11 月湖北以黄冈县为试点开始筹办彩票发行事宜,12 月,黄冈彩票正式发行,每张售价 1 000 文,头彩得洋 1 000 串。接着,张之洞于 1902 年 1 月 11 日正式奏请创办湖北全省彩票公司,在汉口设立总局,发行湖北签捐票,第一期定额 20 000 张,每张 6 元,头彩 50 000 元^[11](25 日广告)。就赌博的花样而言,清人可谓竭尽其能,既翻新旧有赌博的花样,又新创新设赌博名目,在赌博上费尽心机、花尽力气。由此,可以看出清人对赌博的投入与迷恋了。

(二)遍及各地

赌博如同传染病,自其一滋生,就风行各地,遍及大江南北,普及大小城镇乡村。清代赌博流行的地域之广亦为此前各朝所不及,尤其是清朝中后期赌风甚炽,各地都盛行赌博:江苏盛行马吊、纸牌,浙江、江西、安徽、广东、福建、上海、天津等地流行花会赌博,广西盛行掷骰斗牌。就地域而言,各府、州、县都有赌博,几乎没有一块净土,区别只在于程度的轻重与范围的大小。清代赌博的分布地域有其不平衡性,经济稍显落后的地区,赌博的风气要弱一些;越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,赌博越是厉害,其涉及的地区之广、参赌的人数之多以及赌资的巨大都较它处所不及,闽粤、江南的赌博风气就相当严重。据称,粤人好赌,出于天性,全粤赌风甚炽,几成赌国,赌馆甚多,光广州城内外之赌馆就有 600—700 处。江南是财富重地,赌风亦盛,“三吴赌风甚盛”^[12](第 103 页),无处不赌,“习尚好赌,遂至无处不赌,无日不赌,而各市镇尤多”^[13](卷 8)。

(三)参赌人员多,遍及社会各个阶层

就参加赌博的人员而言,清代参赌的人员众多,遍及社会各个阶层,“上自公卿大夫,下至编氓隶,莫不

以及绣房闺阁之人,莫不好赌”^[14](卷 21),不论性别、职业,不论文化、地位,大都卷进了赌博的漩涡。以江苏太仓为例,各色人等都参与赌博,“近则绅士俨为窝主,习不知非,乡镇倚庇,衙差公然聚赌,以至私泉、光蛋,百十成群,开场纵赌,农人辍耒以嬉,遂至抗租倾产;又有游手无赖,于秋间设局为斗蟋蟀之戏,谓之开插,以纸花为筹标决胜负;冬则易为斗百鹤鹑,谓之开圈,与赌无异。”^[15](卷 3)太仓一地,上自官员、绅士,下至私泉、光蛋、农民、游手无赖等都参与赌博,大至全国各地,其参赌人员之多就不言而喻了。赌博遍及全社会,地位不论贵贱,文化不论高低,性别不分男女,职业不论高下,都沉迷于赌博,湖州府属的濮院镇有一种赌局叫“李宝场”,吸引了男女老少各色人等如痴如醉,“……举凡贡监、生童、红闺妇女、贩夫卖妇、总角学生,无论识字不识字,群起而打字宝,……举国若狂,日盛一日,而妇女针线筐中及小儿衣裤带上之钱收拾净尽”^[16](第 90 页)。由参赌人员之多,足以看出清人对于赌博之沉醉,也足以看出清人精神之空虚与堕落,他们别无追求别无寄托,唯把赌博作为生活的寄托与消遣,心里空虚之极由此可见一斑。

如上所述,清代赌博有其特色,其花样之多,涉及地域之广,参赌人员之多,为此前各朝历代所不及,可谓空前绝后,赌博成了清代尤其是其中后期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。

三、清代赌博的社会危害

清代赌博风行全国各地,遍及社会各个阶层,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:“荒弃本业,荡费家资,品行日即于卑污,心术日趋于贪诈,父习之则无以训子,主习之则无以制其奴。”^[4](卷 82)赌博成为社会的一大恶习,“天下之恶,莫过于赌”^[17](卷 9),“民间恶习,莫过于博戏”^[4](卷 82)。而且,它还引发了斗殴等其他社会问题,“斗殴由此而生,争讼由此而起,盗贼由此而多,匪类由此而聚”^[4](卷 82),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。赌博危害人心,败坏风俗之处不可胜数。赌博对个人的危害也极大,使得“富者贫,贫者饿”^[18](卷 8)。参与赌博者往往丢弃生计,倾家荡产,“开赌者丰衣足食,爱赌者荡产倾家”^[19](卷 1),原本富有小康之家,因为赌博,变得一贫如洗,还有因为赌博输光了家产,典妻卖子卖房屋,结果走投无路,不免一死。赌博害人害己害社会,危害甚大。对于赌博的危害,清人也有认识,理学名臣汤斌、地方官吏陈宏谋等多次呼吁禁止赌博。汤斌就任江苏巡抚时,发布抚吴告谕,移风易俗,禁止赌博,他用暂为监禁的形式帮助赌徒戒赌。陈宏谋认为制造赌具者、贩卖赌具者都有罪,还说“窝赌有罪,抽头有罪,贿赌有罪,同赌有罪”^[20](卷 8),他又制订了《风俗条约》,明令禁赌。汤斌等人的禁赌实践有其积极意义,但是与那日甚一日的赌风相比,他们的这些禁赌措施显得非常的弱小与无力,他们制止不了那赌风。就官方而言,清初政府还采取了一些严厉的禁赌措施,使得赌博一时还不太明目张胆,然而随着政府自身的日益腐朽,清朝中后期,放松了对赌博的限制,虽有些法律条文明令禁止赌博,但是因为众多官员的参赌与导引,那禁赌的法律条文也成了一纸具文,不大起作用,结果,日益炽烈的赌风加剧了清朝的腐朽与没落,成了清王朝灭亡的催化剂,可见赌博的社会危害之巨大。

鉴于赌博的巨大危害,鉴于历史的教训,今天我们也要对赌博有个清醒的认识。一段时期以来,赌博这种恶习沉渣泛起,少数地方少数人又开始参与赌博,打麻将、斗地主(扑克牌的一种赌博玩法)等在少数人之间流行。某报纸还做广告,传授“千王”牌技,说是掌握了那技术,用骰子、麻将、扑克赌博时要风得风,要雨得雨,竟然这样公开宣扬赌博。赌博浪费了钱财,消磨了人们的时间,而且还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,也有损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。因此,我们要从自身做起,呼吁全社会抵制赌博,提倡健康、文明向上的生活方式,将赌博扫进历史的垃圾堆。

参 考 文 献

[1] 大清会典事例[M],清光绪三十四年(1908)刻本。

[2] 清太宗实录[M],北京:中华书局影印本,1985。

- [3] 余 金. 熙朝新语 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, 1983.
- [4] 清世宗实录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影印本, 1985.
- [5] 徐 珂. 清稗类钞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点校本, 1984.
- [6] 清高宗实录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影印本, 1985.
- [7] 清仁宗实录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影印本, 1985.
- [8] 王卫平. 清代吴地赌风述论 [J]. 苏州大学学报, 1993, (3).
- [9] 冯尔康, 常建华. 清人社会生活 [M].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1990.
- [10] 欧阳昱. 见闻琐录 [M]. 长沙: 岳麓书社, 1987.
- [11] 广告. 中外日报 [N]. 1902-02-25.
- [12] 陈宏谋. 风俗条约 [M]. 转引王卫平. 清代吴地赌风述论.
- [13] 郑钟祥. 常昭合志稿 [M]. 清光绪三十年 (1904) 刻本.
- [14] 钱 泳. 履园丛话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9.
- [15] 王祖畬. 太仓州志 [M]. 民国八年 (1919) 刻本.
- [16] 沈 梓. 避寇日记.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 [Z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61.
- [17] 尤 侗. 戒赌文. 昭代丛书别集 [Z]. 道光二十九年 (1849) 刻本.
- [18] 杨震福. 嘉定县志 [M]. 清光绪八年 (1882) 刻本.
- [19] 钱肇然. 续外冈志. 上海史料丛编 [Z]. 1961年铅印本.
- [20] 陈宏谋. 培远堂偶存稿 [M]. 清光绪二十二年 (1896) 湖北藩署重刊本.

(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)

Gambling in Qing Dynasty

WANG Mei-ying

(School of Humanities, Wuhan University, Wuhan 430072, Hubei, China)

Biography WANG Mei-ying (1966-), female, assistant Professor, Doctoral candidate, School of Humanities, Wuhan University, majoring in history of socioeconomic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.

Abstract With a comparatively small quantity of participants, gambling didn't form a serious social problem in early Qing dynasty. However, when it came to its middle and late periods, with a large variety of forms, a wide coverage of aread and a great number of participants, gambling brought very ill effects to the society. It was rooted in the corruption of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governments, which resulted in a fable immunity of the society against gambling an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unemployed citizens to whom gambling made a great attraction for its entertainment and lucrative potentiality.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hesis point that gambli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political corruption. The more corrupted a government is, the more popular gambling becomes. Gambling, as a barometer of political corruption, can accelerate the corruption and degene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in return.

Key words Qing dynasty; gambling; social problem; study